

冰天雪地芳草地

——我和《文艺报》的49年交往

□王宗仁

生活中总有一些期待,在突然降临时,你才明白多么需要它来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饥渴。我就是这样邂逅《文艺报》的,49年前缘于与李瑛的一次见面。

1965年初夏,我身上带着昆仑山的雪迹,到北京参加总政举办的第九期新闻班。一天下午,趁着学习的空隙,我带着自己的一组诗稿和李瑛的诗集《红柳集》,到定阜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送稿。说是送稿,其实在我心里比这更看重的是让李瑛给《红柳集》签名。在我的文学生涯中,他的诗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那些西北题材的诗。我来到李瑛和纪鹏共用的一间窄小的办公室,他接过我的诗就看起来,还不时用铅笔在诗稿上划一下。我坐在他对面,无意间看到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文艺报》,好奇,还有这样的报?我便顺手拿起来翻阅。真开眼界,张光年、冯牧、李準都在上面写了文章!李瑛很快就看完诗稿,说可以“留用”。他见我拿着《文艺报》在看,就说你们在高原那个地方比较偏僻,交通不便,据说当天的报纸20天以后才能看到。我告诉他,这个《文艺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这真的不奇怪,常见在边疆跑车的汽车兵,就是《人民日报》也难见到。李瑛说,从事文学创作一定要多读书,这个《文艺报》不能不看,你要是喜欢它就去看吧!

临别前,李瑛再次让我选几本《文艺报》带走,说着他又从书橱里拿出几本放到我面前。不好意思多选,只带走了1965年第5期《文艺报》。这一期有部队作家林雨写的创作体会《在实践中学习,在斗争中成长》,还有别人评论其小说的文章。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会记得林雨这个名字,他当时创作的军事题材小说《刀尖》《五十大关》在全国引起广泛好评,我很想知道他的创作秘诀。那次我返回高原,读《文艺报》上那篇林雨小说的评论,我摘录下一段文字,那是在说林雨在创作《五十大关》时是怎样“想”的:“由于作者在生活中‘想’得深,‘想’得广,‘想’得远;从个人想到集体,从连队想到全军,从国家想到世界,从军事训练生活想到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想到大兴三八作风……因此作品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广、比较深厚。所以,不同地位、不同生活经历的读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去感受,接受不同的启发与教育。”今天重读我抄下的这段文字,觉得它仍然对文学创作、对人生有可贵的启示。

那次进京,两大收获,一是见到了想见的诗人李瑛,二是结识了一个文学益友《文艺报》。当然也有遗憾,没有得到李瑛的签字。弥补这个遗憾是在32年后,1997年11月,我找李瑛请教创作的问题时,拿出《红柳集》,说出原由,让他签名。他接过诗集,想了想,在扉页上写下一句话:“这是一片枯萎的叶子。”我一直回味不出这片“叶子”的蕴含。到哪儿寻找一片树林?从何处得到一方青草?就从珍爱这片“枯萎的叶子”起步吧!我还想说,我这一生在青藏高原的雪山冰河奔波,与《文艺报》相交差不多半个世纪,她也是滋养我文学人生的冰天雪地里一片蓬勃的丛林,一方温暖的芳草地!

什么时候你如果觉得生活或写作不愉快了,就抬头望望窗外,有无限风光。此后,《文艺报》渐渐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我就理所当然地把她比做窗外的阳光。其实,所有的阳光都在自己的汗水里。我从《文艺报》吸获的营养自然是文学,但我更看重隐藏在文学后面的做人的营养。我尤其关注老一辈作家、艺术家、编辑的文章或别人介绍他们的文字,真情实感,口心一致。因为这个时期的我已经懂得了,其实现实生活中有不少虚假的东西。一些人谈自己或借别人之口谈自己的文章,言过其实,水分过多。老一辈作家、艺术家们则不然。在“文革”结束不久以至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要珍惜一张报纸或一本刊物不容易,而要忽略它们太容易了。《文艺报》一直是桌上、枕边的读物。

1989年8月,我的第10本作品集《昆仑山的爱情》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从未谋面的四川大学教授曾昭义写了一篇评这本书的文章,他寄给我并附一信,希望文章能在《文艺报》发表。我自然和曾教授怀有同样的发表欲,可是当时我在《文艺报》没有一个熟人。无奈,我将文章转寄报社,并附上曾的信。说我那时没有期盼那绝对不真实,但是在人生地不熟的时候,我只能选择等待。让我料想不到的,没出半个月,这篇评论刊登出来了。这就是发表在《文艺报》1989年12月30日文学评

我知道这篇怀念文章早晚会写的。但我多么希望它来得晚一些再晚一些,可是噩耗还是在8月初从遥远的加拿大传到苏州又传到北京。我的好朋友、好大姐、好老师——女作家吕锦华就此就真的与我天各一方,再也不相见了。

记得前年暑假,我陪夫人、女儿到苏州游玩,得知大病初愈的吕老师在吴江居住,我就让文联主席俞前帮我联系,问能不能跟吕老师见上一面,如果能在一起吃顿饭就再好不过了。我并不是没有吕老师的电话号码,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扰她,不知道她身体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

2010年夏季,同样是夏季,我到阳澄湖去采风。得知我到了苏州,吕老师专门从吴江赶过来看我,并且与我一起观看了当地渔民的演出。我对吕老师说,这么热的天,真难为您跑一趟。吕老师说,我必须得来,你是我的小老弟啊!

那日的黄昏,我看到吕老师的身体有些憔悴。就对她说,您的身体好像很疲惫,是不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吕老师说没事没事的,就是中午没睡觉造成的。吕老师说完,又陪我待了半个小时才离开。那天,我第一次在分别时和她拥抱,我每次见到她都感到非常的温暖。

然而,我不曾想到的是,没过3个月,苏州的文友就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吕锦华老师住院了,诊断为癌症。我当时一听,就感到大脑一片空白,怎么能这样呢?文友说,吕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心情一直不太好,有点压抑,听说为了孩子出国,她把苏州市区的房子都给卖了。

在住院期间,吕老师的手机关机。我只能通过朋友不断地去打听她的病情。当我得知,吕老师在手术期间,她的女儿竟因孩子太小没有监护人而无法回国照顾母亲时,我感到人生好凄凉。好在经过几个月的生死挣扎,吕老师终于脱离了危险,让大家稍微地松了口气。不久,我终于拨通了吕老师的电话,在听到她那熟悉的吴侬软语时,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深情地叫了一声:“吕老师……”

我们一家人的到来,使吕老师异常的兴奋。她对俞前说,红是我小老弟,一定要见,特别要见见孩子。吕老师的外孙女和我的女儿一样大,从2001年我们相识以来,她总惦记着我女儿,给她买漂亮的衣服。我对女儿说,在苏州你有你个吕奶奶,她可喜欢你呢。

吕老师对人的关心不是表面的,是具体的,更是润物细无声的。记得我跟吕老师的第一次相见是在2001年苏州散文笔会上,会议是由某文学刊物和同里镇政府联合主办的。吕老师当时担任着苏州市文联副主席,主抓文学创作。在会议结束后,该刊物的主编对吕老师说,要派车把某某领导和几个名家送到火



《文艺报》由刊改报后,夏衍仔仔细细阅读并提出改进意见

我与文艺报

庆祝《文艺报》创刊65周年

论版的《评王宗仁的散文报告文学》,3000多字的篇幅真不算短。我知道文章责任编辑是孙武臣时,事情已经过了6年。当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次文学会议上,偶尔遇到孙武臣,他主动找到我,我们才相识。这时孙已调到鲁迅文学院。从此我们常有来往。两年前,他还把自己出版的一本谈论散文创作的书赠予我。生活中虽有偶尔,但它昭示的却往往是必然。没过一个月,1990年1月28日,《解放军报》也刊登了一篇评《昆仑山的爱情》的文章——《镌刻在昆仑之巅的碑文》,作者是刘业勇。我们也是互不相识。两年后刘业勇调到解放军报社工作,我才知道他原来是第二炮兵下属一个基地的宣传干事。

我真的好感慨:看明世事透,认得当下真;名利可轻抛,事业争千斤。如果说我还有期待的话,就是希望我周围还有许多业余作者能从《文艺报》汲取文学力量。应该说,进入90年代后,《文艺报》与我所服役的总后勤部作家的来往空前频繁。时任总后勤部政委周克玉多次强调在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大大文化的含量。他要求后勤要建立一支自己的文学队伍。总后政治部文化部长卢江林就是中国作家协会老会员,创作过长篇小说和电视剧,抓文学创作自然是内行,很得力。领导掏取天池水,洒向作家都是情。再加上周大新、马泰泉、王宏甲、曹岩、烈娃、咏慷这样一批卓有成就的专业作家的引领,我呢,作为创作室主任就是具体来落实。天时地利人和,总后的业余作者队伍如雨后春笋,充满活力,富有激情。我们每年都要组织一到两次文学笔会,两年一届的总后军事文学奖一直坚持至今,我们的作品多次亮相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当代》《十月》《解放军文艺》等报刊。我们申请经费为11位业余作者出版了他们第一部作品集。《文艺报》对总后这支创作队伍多次报道和给予评论。据我的记忆,李瑛、张锲、陈建功、高洪波、雷达、朱向前、黄国伦、张志忠、丁临一、周政保等作家评论家,都在《文艺报》发表过评论总后作家作品的文章。有一件事让我难忘。有一次,当时在《文艺报》工作的贺绍俊参加我们在京郊举办的文学笔会,他深入到与会作家之中,和他们做朋友,推心置腹地交谈,了解了这些业余作者艰难成长的历程。笔会结束后,他把我作为穿针引线的“中间人物”,写了一篇长篇通讯《双重的神圣——王宗仁和青年作者的故事》,在《文艺报》头版头条发表,还配了几张图片。这篇通讯引起了广泛关注,它的影响延伸到了部队的基层单位,青藏高原一些团队在他们的政工简报上还作了介绍。

我曾经在全军一次创作会议上,介绍总后业余文学队伍的成长时,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领导的重视,诸多评论家的扶持,还有像《文艺报》《解放军报》这样媒体的助推,无形中将这支文学队伍筑起一道温馨的围墙,抵挡并消解生活中常常遇到的冷意或者阻力。我们知道,业余作者成长的道路大多数不是一帆风顺的。

站。吕老师问,那红呢?那刊物的主编说,他还年轻,让他自己解决。吕老师听后当时并没有直接顶撞那位刊物主编,而是专门让她的司机开车把我送到火车站。

在苏州,被吕老师扶持帮助过的中青年作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其中不乏许多在文坛已经成名的作家。大约在五六年前,她向我介绍了在银行工作的女作者范婉。范婉学的是金融专业,早年在上海浦发银行,后又回到苏州中信银行工作。这个女孩修养很高,对银行业务游刃有余,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她拿出大量的时间投入到散文、小说创作中。吕老师对我说,她年岁大了,家务事缠身,精力不如以前,希望我能替她多关注小范。小范最初给我的作品是一部中篇小说,我看完发现她的散文语言更浓郁一些,就建议她写散文。小范告诉我,她已经写过十几篇美术方面的散文。我看过后,发现她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于是,我把铁凝的美术散文集《遥远的完美》邮给她做参考。小范悟性很高,一年后,她写出了81篇美术题材散文,经我介绍,百花文艺出版社为其正式出版了名为《跟着美术大师漫步》的散文集。这之后,她又尝试写苏州地域文化小说。如今,范婉已先后获得第四届冰心散文奖、郭沫若散文奖和叶圣陶长篇小说奖,成为苏州甚至是江苏有影响的青年女作家。每当看到小范的进步,吕老师都会时常打电话对我说,谢谢你对小范的帮助。而我深知,真正帮助小范的恰恰是吕老师。

获得吕老师类似帮助的还有俞前、黄霞君、徐宏慧、阿华、葛芳等许多人。十几年来,我亲眼目睹了她是如何热心地帮助我筹备了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黄霞君散文研讨会、太阳湖笔会、吴中区文学讲座等活动。这其中还不包括她向我推荐多人加入中国散文学会,在我主持的报纸副刊上推荐业余作者的稿件。听到吕老师生病和去世的消息,给我打来电话的,很多都是那些普通的业余作者。

对于今天的文学读者,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吕锦华的名字。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她的散文就已经广泛文坛关注。她出版的散文集有《何时入梦》《总想为你唱首歌》《边走边唱》等10部,另有传记文学《森林女神》等五六部。很幸运的是,在2001年的秋天,我为她新出版的散文集《空谷佛音》写了评论,也因此从深层更加接近和了解了吕老师的为文与为人。

吕锦华的散文是清丽、婉约的,尤其注重情感和意韵的表达。从交往的这十几年看,我始终不明白以她那样的文学才气为什么越写越少了呢?于是,我在灯下重新翻看她的书,希望在书中能找到答案。

答案肯定有的。我以为就是她的书名——“空谷佛音”。

时下有所谓的“信息爆炸、全媒体、自媒体时代”一说,是,人们接受和传播信息如此快捷,如此多元,如此混沌,又如此的简单,超乎寻常想象。若不见,如同股市的行情盘面随时都在翻转腾挪,信息的更换也以分秒计,信息的覆盖无所不在,由此,对于新闻报纸如何适应,如何生存,提出了挑战。当然,作为一份文艺类的专业报纸,《文艺报》如何吸引读者,如何在艰难的阅读环境中,求生存得发展,多有难度。

都说,人间要好诗,生活不能没有文学;有文学,也就少不了这份报纸。

我记忆中与《文艺报》的交集,是在上世纪的事,时间真快,5年前,在北京纪念《文艺报》创刊60周年的事,嘉宾如云,讨论文学批评的诸多问题作为纪念主题,建言献策,热热闹闹,恍如昨昔。

记忆中,我对《文艺报》最早的印象是那份半月刊杂志,骑马钉的装帧,白色素雅封面,阿拉伯数字的期数标识,给人以醒目而不失亲切、轻松而不失厚实的感觉。集鲁迅字体的刊名更显得书卷味很浓。她以理论和评论文字阐释文艺重要现象与走势趋向,也有一些文艺热点问题的评述与介绍。具体的栏目设置,因时间久远已然模糊,但突出印象是文学类多,艺术类少些,理性分析的文字多,新闻性的报道偏少。仅就这些,我当时觉得叫“报”,不太名副其实。但是我习惯于从那些众多栏目中,读到对于我所喜欢的作家与作品的评介,也喜欢那些即时的文艺现象与文艺情况的披露和报道的文字。其时,《文艺报》在粉碎“四人帮”后思想解放的年月,在文艺形势刚刚解冻,揭批“文革”的思想禁锢逐步展开的新时期之初,坚持直面当下重大文艺论题和思想,独步于文艺刊物之林。上世纪50年代初,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最高领导人的介入,成为一时谈资,也成为一段显赫的历史,凡几十年,虽“文革”期间停办,在她复刊之后,仍然给人们一种权威而神圣的印象。不客气地说,《文艺报》在新时期之初,是众多青年作者的文学高地,我开始学写作,就把杂志中的诸多文章当范文,虽然我到北京后最早投稿,记得是《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因为有一个刘姓学长在那里做编辑。而《文艺报》是我们文学青年必读的。那时,在图书馆,在书店,书摊,这份杂志很醒目地摆在前排。每每在这样的场合,我首先拿起的是她,也因为仰慕,想象着有一天能在上面发表文字。这个愿望虽然好久没能实现,却一直是我心中不大不小的目标,而在后来,更让我有幸成为她的编辑同仁们的朋友。

当年文艺报社在沙滩大院,我没有特别地去拜访,那时候我刚步入新闻工作,编辑副跑文艺口,同文艺界联系多了,同文艺报社的同行接触也多了。80年代中,就与《文艺报》的陈丹晨、吴泰昌、孙武臣、何孔周、朱晖、贺绍俊、张陵、潘凯雄等前辈或同道们,以及晓蓉、臧小平、陈明燕、沙林诸位跑新闻口或副刊的同行熟悉。记得几年后,忽然看到《文艺报》改半月刊为周刊,改杂志开本为对开的报纸,读到她时心中不免戚戚,一时还不习惯,觉得少了那份庄重和厚实。私心想,同是办报人,我更希望这份专业文艺报纸雅致、机敏、厚实、耐读,可收藏留存,是文艺报刊中的重武器、金盛宴。一段时间后,她办得风生水起,人气很旺,读者不乏好评。报纸栏目多样,说文谈艺,即时的重点作品述评,个案的人物采访,可谓“文武混乱不挡”,时事新闻、文学评论、美术影视、书画副刊等等,各呈异彩,相得益彰,轻盈又厚实,动静相宜,有了评述与报道兼具、点与面结合的面貌。由于出版周期短,新闻性纪实类的增强,更有一种报告当

《文艺报》往事点滴

□王必胜

下、及时再现的快捷,一些纵览文坛风云的特别策划,出于本报编辑记者的手笔,既有新闻时效的敏锐,又有专业性的扎实丰厚。渐渐地,她“报味”突出,形成自己的路数和面貌,也为我们众多新闻和文学同行们所羡慕。

约在30年前吧,我那时住在建国门桥附近,一日晚间,步行到附近的小羊宜宾作协宿舍孙武臣先生的家串门。老孙当时是评论部的头儿,朱晖是他的搭档,老孙健谈且嗓门大,说到兴奋处,以笑声代替表达,激起你的聊天兴致。他知道的文坛掌故也多,再加上说话时一口一个你的名字,让你感到亲切自然。那天,我说起一篇文章选题,他说,讲讲提纲,我记得好像是关于改革小说的内容,在他的客厅里,竟让我从头说说我文章内容,当时,搞得我有点紧张和不安,心想,我来拜访聊天,你是不放心我文章水平,还是因职业习惯不忘工作?文章在《文艺报》发表后,他说,你写得比说的好啊。殊不知,那么晚了,在那里同你说文章,情绪和心情会好吗?记不起最先向《文艺报》投稿的是哪篇文章,经朱晖兄和老孙还是谁了,但在80年代内,我只写过三五篇小文章,最早的是关于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后来是周大新的中篇小说述评等。但是,秦昆、武臣、朱晖等事评论的诸君,约我写或催我动笔,才让我的文字成为铅字,也遂了当年学写作时的夙愿。

如同人一样,报纸也是有个性的,《文艺报》的个性,是沉稳中见轻松,这取决于她的办报思路。报纸的出版周期短,开本设计大众化,内容讲求时效性,在及时捕捉现象的同时深入研究理论问题。说是“报”,因为报道现实,快速追踪文坛事件,也无不可,而她常有深度的探索和理论的解读,又有刊物杂志的理性化色彩。她是报也非报,亦新闻报亦理论评论,理论批评宏大叙事,报道特写轻松活泼,成就了这份报纸的可读性与专业性的结合。新闻是易碎品,但也是未来的历史。在当时的文坛这类报纸不多,《文艺报》是龙头,顺应那时期热热闹闹的文坛,改版后有声有色,为人关注。这个特点一直延续下来,只是,改版以来也近30年了,现在的文艺形势和文化生态,特别是读者阅读的趋向发生了极大变化,文学不像那时风光无限,集万千宠爱,如此一来报刊要随时代变化调整是不可回避的,坚守和保持习惯的思路,怕是难以让更多读者关注。在全媒体时代,报纸要有时效,但与网络无时不新、无远弗届的功能相较,也是滞后的。专业性的学理性的文字是提升品位的一个重点,可是,报纸版面篇幅受限制,同杂志相比,专门化的深入和理论性的阐述,在有限的版面上是捉襟见肘的,报纸的大众化和新闻性,与杂志刊物的沉稳与厚重,可以互补,但也可能是双刃剑。

20年前,文艺报社刚搬到了现在的办公地点,每有机会,去那个有点拥挤的办公室里转转,在文学部或者理论部,总有老孙兄、朱晖兄、凯雄、张陵,还能看到总在忙碌的绍俊等人,或者,到向阳一面的秦昌先生办公室坐坐,找他的人或电话多,抽根烟就抽身。而老孙和朱晖总是以一种玩笑的方式接待熟悉的朋友,总见他们有笑料产生,对口相声或插科打诨,朱晖说再由老孙捧,常留住我及众多的来访者,开怀大笑,或引火烧身似的被调侃之后,没来得及说正事或者看一下诸位博学者们案头上的图书文稿什么的,就到了中午时分。这没有目的的造访,感受到的文学的随意、亲和,或者一份报纸同仁们的随和、亲近。而今,这几位都离开了报社,而那份友情,文学热闹时代的编辑们轻松活跃相处,深深地印在我心中。每在读到这张报纸时候,就想到他们,想起那不再有的时光。



2014年夏天。忘忧国——马尔代夫芙花芬岛。

大睡懒觉,游泳,浮潜,做SPA,打扮,拗造型,拍照片,欣赏照片,看落日,喂蝙蝠鱼,看水鸟,看书,吹海风,在海浪声里发呆……基本构成了岛上的离世生活,而每时每刻与我们一起呼吸着同一片空气,踩着同一个慢节奏的,是一群仙子般的生灵。

院子的洗漱台上,一只蚂蚁卡在梳齿上,头歪来歪去挣扎。这里的蚂蚁有平时见过的三个那么大,淡黄色的。我拿起梳子走到露天游泳池边,轻轻敲了敲梳子,让它滚回了沙地,爬走了。

除了蚂蚁,经常与我们狭路相逢的是蜥蜴。有次看到两只蜥蜴在路边打架,看我们走近,停下来,瞪着我们,并不怕我们,大家都呆住不动,过了好一会儿,它们又开始打架,我们也挪到它们跟前想仔细看看,它们又迅速和解,一前一后从容不迫地爬进了灌木丛,阳光在它们身后默默铺上一层寂寥。

另一群生灵是珊瑚与鱼。激动人心的出海、浮潜,看海底珊瑚礁和游鱼,虽新奇,但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是一种挑战。套上救生衣、浮潜罩,戴上呼吸面罩,将脸浸入海水的一刹那,恐惧、新奇,变成了无声的惊叹。人变成了一条大鱼,和大大小小色彩纷呈的鱼一起,在珊瑚礁之间游曳,不分敌我。

日落时分,在岛的一大片沙滩上,有一场“人鱼鸟”约会。大约六七条巨大的魔鬼鱼每天六点半会如期而至。它们随着海浪一次次扑上沙滩,扑到人们脚下,翻腾起肉肉的软软的翼。它们和喂鱼人亲热,攀爬上他的肩膀,跳舞一般盘旋,与我们这些哇哇乱叫的游客嬉闹,一次次扑腾,乐此不疲,仿佛是一群孩子,很温顺,很调皮。我斗胆将光脚轻轻踩在它肉肉的脑门上,它翻着两只白眼,神情却好像是高兴的。而这片沙滩上,永远站立着一只孤独的水鸟,仅此一只,它也会吃到喂鱼人丢给它的肉,冷眼着人们与鱼的忘情嬉戏。一小时后,蝙蝠鱼和晚霞一起消失,奇怪的是,那只鸟也一起消失了。

在这个陌生的南印度洋岛国,你会惊叹,人与自然是动物怎会如此亲密,这仿佛已经是远古时候的事了,远古时候,我们同是大海的子民。

芙花芬岛的深夜来临时,大海像一个累了一天的男人倒头睡去,呼噜声很响,人和着它的呼吸也沉沉睡去。

假如此时从天空看,一个人,一只鸟,一群精灵,都像一个个婴儿睡在巨人的怀里,把所有的生老病死忧愁烦恼都交给了宇宙间这一滴最大的水滴去稀释。

苏沧桑图文

